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04.02.014

儒学东进及其对日本古代教育的影响

关 松 林

(沈阳师范大学，沈阳 110032)

摘 要：中国儒学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世界教育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同属亚洲文化圈的国家的教育更是影响深刻。本文分析了儒学传入日本后所经历的不同发展时期，着重阐述了儒学对日本古代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儒学 日本 古代教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4)02-0083-05

中国儒学是世界教育史宝库中的瑰宝。曾对世界许多国家产生影响。约在公元5世纪传入日本。虽然儒学初传日本时，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传播的速度极其缓慢，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日本并没有受到激烈的排斥和反对，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到了公元6世纪以后，日本人开始认识、认同这种外来文化，并逐渐纳入到日本固有的文化体系之中，成为日本文化长河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

如果从历史上考察，儒学在日本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缓慢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历史发展过程。当日本社会进入7世纪之后，最早进行改革的是圣德太子，他在603—604年间，推行了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圣德太子是中国文化的推崇者，年轻时“习内典于高丽僧惠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可悉达矣”。[1]他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不仅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表现出儒学思想的影响。其中，第一条中“和为贵”，出自《论语》“礼之用，和为贵”；“上下和睦”出自《孝经》“民有和睦，上下无怨”；第三条中“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出自《左传》“君天也”；“天复地载”出自《礼记》中的“灭之所复，地之所载”；第四条中。“上下礼而不齐”，出自《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第六条中“无忠于君，无仁于民”，出自《礼记》中的“君仁臣忠”；第九条中“信是义本”，出自《论语》“信近于义”；第二十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出自《礼记》“天无二日．土非二主”；第十四条中“五百岁之后，乃今通贤”，出自《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第十六条中“使民以时”，出自《论语》“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此外在《古事记》、《日本书纪》及日本最早的汉文诗《怀

收稿日期：2004-01

作者简介：关松林（1960— ），男，辽宁盖州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现任沈阳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风藻》中，也表现出儒学思想的影响，以后又不断地由留学生及学问僧带回儒学经典，还出现了菅原清公、菅原是善、菅原道真、三善清行、大江朝纲等传播儒学的使者，直到12世纪以前，被称为日本的早期儒学，是日本儒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它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程度，虽不及江户时代的儒学，但在这一时期，儒学被视为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加以应用，其功用超过了其它时代的儒学。到13世纪时，由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及赴日本的中国僧人，将宋代儒学传入日本。这些人都是禅僧，到日本后在传播禅学的同时，主要还介绍朱熹、二程和张横渠、杨雄的著作和思想，促进了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到14世纪时，在禅僧中出现了一批同时讲授儒学的人，即“五山僧侣”。当时，他们几乎独占了日本儒学。同时，儒学也逐渐深入宫廷，出现了一批研习儒学的公卿贵族学者。到16世纪时，逐渐打破禅僧独占儒学的局面，形成了博士公卿、萨南、海南三个研究宋儒的学派，他们不但注重儒书、诗文的讲解，而且侧重到思想、政治及经济方面。到室町时代末期，在这一些地方统治范围内（如关西、土佐），儒学思想逐渐占主要地位，成为地区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儒学的勃兴、传播速度的加快，为江户时期儒学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朱子学传日本，经过350多年的传播，逐渐地兴隆起来，并被德川幕府奉为“官学”，成为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中，藤原惺窝（1561—1619）是使儒学在日本最终摆脱禅学的束缚，成为完全独立学派的功臣。由于他的贡献，儒学不再是禅僧们倡导的缁流文学，而向伦理化方面发展。因此，有的学者又称他为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林罗山（1583—1657），一生除从仕50余年外，还著书立说，批判佛教，促进了日本儒学的独立。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要了解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不可不了解林罗山其人”[2](p.87)，17世纪末兴起的古学派，是朱子学的反对派，他们认为儒学只有回到古代才有意义，后来的全是伪说。因此，它是一个以古典经典为依据的哲学派别，名为复古，实际上是在朱子学以外提倡一种与朱子学对抗的新学派。它是企图从古典中寻找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归到“经世之学”与实用之学。古学派的思想是日本儒学中最具日本特色的一部分，充分地表现了日本文化与日本民族心理的特征，其代表人物伊滕仁斋（1627—1705）和荻生阻徕（1666—1728）对德川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7世纪中期，随着日本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中小地主阶级产生，城市平民力量不断壮大，封建制度开始动摇，加上古学派的崛起并与朱子学相抗衡，更使封建等级制度的枷锁不得不松懈下来。18世纪末期，阳明学派再度勃兴，形成了继古学派之后与朱子学相抗衡的局面。在当时，阳明学派主要代表了下层武士、中小地主及市民的利益。因此，有的学者称阳明学派为“民间学派”。但是，到幕府末期，它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贫民和农民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也反映了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总之，日本阳明学派既有复古的倾向，又有重视实践的意图。特别是重视“洋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造就了一批“维新志士”。同时，阳明学者的一系列辩证法思想，成为日本辩证思想的先导之一，为日本近代辩证法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作了准备。

到了荻生徂徕时代，日本儒学达到发展高峰，相继形成了朱子学派、古学派和阳明学派，塑造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思想家。但是，在荻生徂徕以后，日本儒学渐渐走向衰落，开始失去思想和理论的创造力，特别是在荻生徂徕死后，形成了以批判徂徕学为特点的各种学派，如在18世纪兴起并风靡一时的折衷学派，企图超越当时各学派的对立抗争，以追求所谓的“圣人之教”考证学派则提出要对古典进行实证研究，但却缺少疑古辩伪精神，因而影响力并不深远；怀德堂学派是以商业资本家为背景而兴起的儒学流派，专门对商人施以儒学

教育。这个学派否定阳明五行说，将其称为“牵强附会”。认为再用如此原始、简陋的秩序图式，还不如把握如此丰富、复杂的自然与人生，逐渐渗透于日本知识界的西方自然科学也向他们提供通异于阳明五行说的新知。随着兰学、国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儒学内部，接受“兰学”影响的儒学者日渐活跃，开始向洋学者转化。这种变化标志着日本儒学开始进入衰退时期。

综上所述，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中吸取营养，并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起来的。但是，日本儒学并非是中国儒学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经过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型物。在奈良、平安时代的早期，儒学主要表达的是儒学的政治思想，并没有言及世界观等问题。到了镰仓、室町时代，朱子学虽传入日本，但它是佛教的附属物，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儒学摆脱佛教而独立，为日本儒学者展开独立的理性思维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儒学者虽接受了中国的宋明理学，并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可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在其思想体系中并没能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到了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儒学者依然忽视抽象本体论的探究。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表现着日本儒学的特点。

首先，日本儒学注重事实、现象和实证的研究。日本大多数的儒学者不仅重视感觉经验和科学技术，而且亲自从事科学工作。江户时代，一些日本学者开始接触和探讨自然科学问题，在朱子学各派中，“主知学派”就比较重视经验知识，并将通过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探索其规律，视为人生之极致，日本古学派的儒学者也大都重视经验知识，因为它是认识和理解科学的前提，这就使他们比中国儒学者更容易面向自然界，更容易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更容易走上近代化发展的道路。

其次，日本儒学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日本的学者认为，中国儒学以“敬”和“致良知”为中心，而日本儒学则以“诚”为中心，这不仅是日本儒学伦理思想的体现，而且标志着日本风格的儒学的诞生。实际上，在江户时期，日本的儒学者对“诚”并未倾注重心，他们大多以“教”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这种观点曾遭到其他一些日本儒学者的批判，到江户后期，以“诚”为中心的伦理学派形成主流。并呈现出较少禁欲主义色彩，对情欲表现出宽容。同时，日本儒学者将“诚”赋予更多的人情味，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在当时的日本，成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伦理学思想。

最后，日本儒学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中国儒学具有强烈的排它性质，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等其它思想流派共存，并且能够在其存在中相互融合、发展。在中国儒学传入日本初期，其内容不仅繁杂、多样，而且体系也五花八门。不过，日本却能做到一视同仁。就是日本早期的儒学，也对佛教和日本固有的神祇崇拜也表现了包容性。在奈良、平安时代，没有发生儒、佛、神道间的思想对立，更没有出现儒学对佛教和神道的严厉斥责。到了镰仓、室町时代，甚至出现了主张神、佛、儒三教合一的潮流。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为摆脱佛教的束缚，才对佛教的“出世主义”进行批判，但由于当时的儒学各派，对日本的神道基本上采取了共存和融合的态度。因此，这种批判实际上只是流于形式。儒学者大都主张神儒一致和神儒合一。表明日本儒学与其它思想的共存以及与自己固有文化的融合。

二

公元 8 世纪，中国处在盛唐时间，是当时举世公认的教育强国。在此期间，日本曾 4 次派出阵容整齐、规模庞大的遣唐使，他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文化教育以及风土人情无所不取。儒学开始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其中对教育的影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

1．教育政策方面　中国的儒学教育，当时奉行“以儒教为主，道佛教为辅”的教育政策，经学在学校中占主导地位，儒学被称为“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的头等学术。同时，中国唐朝还专设有玄学，以学道、施以佛教的寺院比比皆是，每一座寺院就是一所佛教学校。教育思想也和教育政策同出一辙，主张儒佛道教育思想的并存与融合。已表现出向理学教育思想过渡的迹象。在日本推古天皇12年（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其中主要反映了中国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提出了“以儒佛并重，更以佛教为主”的教育政策。以佛教为主，是因为佛教适应了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需要。不排斥儒教，也同样是因为儒教具有安定民心、统一思想的作用。其实质是将儒教作为麻痹人民斗志的一种手段。当然，儒学传入之后，信奉者渐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崇佛而排儒，必然要遭至儒学者的反对，引起抵触情绪，这样，不但要影响佛教的正常传播和发展，也会一定程度上动摇统治阶级的地位。因此，从制定教育的政策的目的看，是何等相似。圣德太子虽然用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实行了某些改革，并未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十七条宪法》的制定和推行，却为儒与佛教的融合奠定了基础，为大化革新过程中教育建设作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2．教育领导机构方面　在中国唐代设国子监，负责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在国子监中设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祭酒。在地方设教育长官——长吏。可见，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比较完备的教育管理机构。同时，中央规定，崇文馆由东宫直接管辖，崇玄馆由上部省下属的同部领导，对于医学，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设立的，一律归太医署管理。这样，除专门学习经学的官学由国子监领导外，其他学校均由各有关部门领导。随着儒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中国唐代这种教育管理体制被移植日本。根据大宝元年（公元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有关学令规定，日本在京城设大学寮（大学），其始建时间暂且不论，它是日本古代国家一级的学校，同时，又是日本当时的管理教育机关。具有学校和官厅双重性质。因此，相当于唐制的国子监。在地方设“国学”，日本当时有三十二国，就有三十二所国学。由中央直接管辖。此外日本还设有典药寮、雅乐寮及一些专门教育机构，分别由宫内省、中务省和治部省领导，实施各种专门教育。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大宝律令》中的“学令”，不过是仿造中国唐代的永徽令的相应内容[3](p.156)。当然，在模仿中也有取舍。从其取舍中可得知儒学的传授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3．学校教育制度方面　在中国唐朝，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各种官学，国子监下属的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算学、书学、律学、医学等。其中国子学、太子学、四门学专门教授儒学，在地方设有州学、县学、医学、玄学等儒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体地位。各级各类学校都有严格的入学资格，它既考虑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又考虑入学者家长身份等级，相比之下，象太医署、太乐署、司天台等相对宽松一些采取师带徒的教学方式。同时，唐代还按府、州、县人口的多少确定教师和学生人数。国子监的长官称祭酒，六学教官26人，学生定员2210人。而根据《大宝律令》学令的规定，设立的大学寮，实际是中国唐制六学的缩小和统一。大学寮归式部省领导，长官称大学头。在大学寮建立初期仅设有明经道（儒学科）和算道（数学科）。大学寮设教官9人，其中明经道有博士1人助教2人，另有音博士（汉字读音）2人，书博士（汉字书法）2人，算道设博士2人。学习儒学明经道的学士最多。定员400人。算道学生仅30人。在8世纪中期又设立文章道（写诗文、史籍）和明法道（教习法律），但学生很少，仅为20人左右。这时仍以习儒学的明经道学士最多。若从学校的规模、教员和学生定员看，日本的大学寮要比中国唐代六学小很多。但若从传习儒学的学生所占比例看，日本大学寮却比唐朝六学高很多。国学

设立较大学寮要晚。学生定员因国的大小而异。大国 50 人，上国 40 人，中国 30 人，小国 20 人，私学的种类较多，情况也很复杂，其中菅原氏的私学规模最大。可谓“门徒数百，充满朝野”，还有空海设立的佛学私学即综艺智院，主要是传授儒学的私塾。

4．入学的条件方面　都有严格的要求。日本的大学寮原则上不接纳庶民入学，是典型的贵族学校。只有 5 位以上的贵族子孙、东西吏部和 8 位以上官吏的子孙以及国学毕业生，才可进入大学寮。学习年限四年，入学年龄在 13—16 岁之间。国学的学生须是地方官吏子弟。定员不足时，才允许庶民子弟入学。私塾的情况不一，有的是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有的则专门招本家族子弟入学。

5．教学内容方面　在中国的唐朝，儒学经典分为正经和旁经两种。正经也分为大经即《礼记》、《春秋》、《左传》；中经即《诗经》、《周礼》、《仪礼》；小经《易经》、《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旁经有《孝经》、《老子》、《论语》。在选择教育内容时，各校情况不一，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科全设，但不要求都学，规定有学二经者，要学大小各一经或二中经；学二经者，须学大、中、小各一经；学五经者，必须大经全学，然后再选一经，选修课为《论语》和《孝经》。日本大学寮的教科书的选择与唐朝相近。明经道的教科书一律为儒家经典，而且必须使用规定的注释，即《周易》郑玄和王弼注本，《周礼》、《仪礼》、《礼记》、《毛诗》用郑玄注本，《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本，在九经之中，大学寮又以《论语》和《孝经》为必修，另可选择其它 2 种、3 种或 5 种经典，可见日本的大学寮更注重儒学传授，国学学习内容与大学寮明经道相同也都是儒家经典。私塾则以学习汉诗文与中国史籍为主。

6．学校管理制度方面　在中国唐朝官学放假分为长短两种。短假为“旬假”，每 10 天休息一天；长假为“田假”，每次放一个月，一般安排在每年的三月份。考试也分为两种：一是旬考，考查学生 10 天内所学课程，二是岁考，考查学生一年内所学课程，岁考共要进行 9 次，连续三次被评为下等，则令其退学，结束 9 年学习后，要进行毕业教育，合格者继续深造或当官。每年 7 月份进行大考。对每位考生问大义八条，凡通过六条以上者评为上等，通过四条或五条者被视为中等，只通过三条以下者评为下等。如三年连续评为下等，或者九年间仍未学完规定课程者，则勒令退学。毕业合格者，由大学寮申报太政官，一起参加式部省举办的任官考试。考试分为四科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按成绩依次授予官位，但官位并不高。所以，有的学者称大学寮不过是中级行政与技术官僚的养成所。

总之，自大化革新至 12 世纪末期，由于日本全面学习和模仿中国唐代教育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校系统。其中既有国家设辖的大学寮，也有地方管理的国学，还有民间自发创立的私学。这些学校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中国儒学的传播体系。因为，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学校，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在江户时期，日本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逐渐成长起来，因而对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等发生了兴趣。出现了儒学、国学、洋学三大系统的学术派别，呈现出了文艺复兴的新形势，使日本在经历了由模仿中国唐代教育制度之后，开始真正建立属于日本自己的教育体系，这是日本古代教育的根本特点。

参考文献：

[1]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元年条．

[2]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3] 见．日中律令论．吉川弘文馆，1963．